

# 調整經濟結構 實現香港再騰飛(上)



2025年，香港面對急劇改變的外部環境，需要全面和客觀地總結經濟發展的歷史經驗，深入分析和正視香港經濟結構的失衡問題，形成符合促進香港經濟轉型的政策體系，最終確定實現香港經濟再騰飛的核心戰略。



朱嘉明 經濟學家 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數據數字金融研究院

## (一) 如何反思香港過去三十年的經濟成長歷史？

當代香港經濟成長歷史，如果從1960年算起，可以劃分為兩個主要階段：第一階段，從1960年代初期至1997年的38年。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，香港經濟四大支柱是出口貿易、製造業、旅遊業和建築業。製造業重要是電子和玩具等產業，以及其他輕工業。1960年代中期，香港第二產業經濟附加價值佔比超過40%。其間，香港實現了經濟起飛。自1970年代末，香港開始向高附加值產業轉型，金融、房地產和商用服務業（包括銀行、保險、航運、地產等）成為經濟的主要支柱。1980年代中後期，香港製造業開始北移至內地。製造業產值在香港生產總值（GDP）中所佔比重從1987年的23%跌至1994年的9.3%。在1980年代，香港經受住了1982年港元危機和1987年世界性股災的挑戰，確定了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。自1960年至1997年，香港人口從311萬增長到648.93萬；GDP從13.21億美元增長到1,773.5億美元；人均GDP從426美元增長到2.73萬美元。在這個階段，香港名義GDP增長了133.36倍，年平均名義經濟增長率為351.4%。

第二階段，從1997年開始。這一階段尚未結束，很可能還要持續10年以上，即到2035年。其間，香港的製造業大規模北移，到了1990年代末，製造業幾乎消失殆盡，僅佔GDP的1%左右，香港完成了去製造業化，甚至是去工業化。與此同時，服務業在香港經濟中比重不斷上升，房地產和金融行業成為香港的經濟支柱。香港進入高度外向並依賴國際投資和外部市場的階段。從銀行到證券、保險、資產管理等各個領域，香港金融業幾乎覆蓋了全球範圍。至2024年，香港人口增長到750.31萬，GDP達到3,820億美元，2023年人均GDP超過5萬美元。1997年至2023年，香港名義GDP增長114.7%，年平均名義經濟增長率為4.2%。在這階段，香港經濟經歷3次重大事件：1997年香港回歸與亞洲金融危機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和2020年至2022年的新冠疫情。

比較香港在1960年至1997年的發展階段和

1997年至今的發展階段，有如下特點：（1）第一階段沒有完成工業化，沒有實現從勞動密集產業向資本和技術密集產業的躍升的情況下，製造業急劇萎縮。（2）第二階段的經濟增長速度顯著放緩。（3）比較第一階段，第二階段的產業結構發生徹底改變。在第一產業歸零的情況下，第二產業比重持續減少。（4）香港經濟與內地經濟的比重，經歷上升到下降的周期，1960年為2%，1997年上升為16%，2023年回落到2%。如果比較香港和北京加上海的經濟規模，1997年，上海和北京GDP合計662.28億美元，相當於香港GDP的1,773.5億美元的37.3%；2023年，上海和北京GDP合計12,787.1億美元，是香港GDP的3,808.1億美元的3.36倍。至於香港經濟與其在四小龍經濟的比重，1960年為17%，1997年為15%，2023年為11%。

## (二) 香港的結構性失衡及其後果

在現階段，香港經濟增長放緩、國際競爭能力後勁不足的表象背後，是香港經濟結構的系統性失衡。

**第一，人口結構失衡。**（1）增長放緩。1960年，香港人口為311萬；1997年為649萬，人口較1960年增長109%；2023年為753萬，人口較1997年增長16%。香港人口結構失衡日趨明顯。（2）人口多次發生流出大於流入。亞洲金融危機、全球金融危機和新冠疫情，都導致香港中產階級和專業人才流失。（3）老齡化。2023年香港65歲以上人口大約佔總人口23%，預計到2049年，全港大約有80多萬人需要長期照護。（4）少子化。香港出生人口長期呈下降趨勢，上世紀六十年代每年有約80萬嬰兒出生，八十年代中降到70萬水平，九十年代中進一步跌至60萬左右，千禧年後跌穿50萬，疫情3年更銳降至30萬-40萬。（5）男女比例失衡。香港長期處於女多男少的狀態，2023年全港753萬人口中，男性有343萬人，女性則有410萬。（6）勞動力短缺。「嬰兒潮」一代陸續退休，加之過去幾年20-49歲移居外地的香港人增加，導致從低技術到高技術勞動人口參與率下降到57.1%，創1985年以來新低。流入香港的人口不能

有效填補香港僅存的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，人口的供給與需求處於結構性錯位狀態。

**第二，產業結構失衡。**在過去的64年中，1980年代是香港經濟的重要分水嶺，自此之後香港產業結構日趨失衡：（1）產業結構單一。1960年代，香港第一產業消失殆盡。之後，第二產業萎縮。2023年的第二產業，即工業與建築業，佔GDP比重僅為6.3%，其中製造業僅為香港GDP貢獻1%；經濟的絕對主體是第三產業，佔比93.7%。第三產業中，金融、貿易物流、旅遊和工商專業服務佔比合計57.1%。（2）生產要素分配極度失衡。資本、人才和基礎設施建設主要湧入房地產和金融領域，抑制了製造業等實體經濟行業的發展空間。其後果是製造業佔比的持續下降，工業基礎日趨薄弱，造成科技、文化創意和旅遊業等新興產業發展相對緩慢，甚至發生衰退，難以形成新的增長動力。最終形成對服務業高度依賴的惡性循環局面。（3）物流與運輸業不振。2023年，物流和運輸業在香港GDP中佔比18.8%。香港的貨櫃吞吐量持續下降，影響了其作為全球轉運樞紐的地位。2024年香港港口集裝箱吞吐量全年下跌4.9%至1,369萬個標準箱（TEU），為1996年以來的28年新低。（4）外商投資規模結構內地化。近年國際環境急劇改變、法規多變、本地競爭壓力上升、語言和文化障礙，加上資料保障等因素，跨國資本在香港的投資止步不前。在這樣的環境下，香港外商直接投資流入轉為內地資本主導，構成香港外來直接投資來源地。內地也成為香港向外直接投資最大目的地。2023年末，外商在香港直接投資總存量為2.1萬億美元，直接投資存量中佔比最高的國家和地區為中國內地（31.1%），其次是英屬維爾京群島（30.5%）和開曼群島（10.6%），以及英國（9.3%）。（5）就業結構失衡。2023年香港服務業僱用了3,259,800人，佔總就業人數的88.3%。金融業雖然在香港經濟中佔有重要地位，2023年GDP佔比高達24.9%，但吸納就業能力有限，就業人口佔比7.3%，導致大量勞動力集中在餐飲、零售等技術含量過低的崗位。這樣的就業結構加劇了貧富差距，阻礙了社會流動性。（6）國際收支波動加劇。1998年至2014年，香港的國際收支支持在±200億美元以內，但

自2015年開始，香港國際收支出現較大變動，2015年達到1,025億美元，至今香港國際收支淨值為負。

**第三，科技結構失衡。**（1）科技產業體系與規劃缺失。香港的科技產業發展長期缺乏系統性規劃。1998年提出的數碼港計劃原本定位為科技產業園，截至2024年僅吸引約1,600家初創企業入駐。（2）政策落地效率較低。2024年香港數據交易生態論壇提出「數據驅動新質生產力」，但實際數據流通規模僅佔內地的2.3%。香港創科政策的制定多依賴外部智庫和行業協會，而非本土科技官員主導。（3）研發投入規模不足。2023年，香港研發總開支佔GDP的比重為1.11%，與其他主要發達經濟體相比仍然較低，例如歐盟2.2%，美國3.59%，韓國4.85%，日本3.41%。2023年香港高等教育機構佔研發支出的55.5%，企業和政府投入分別僅為39.3%和5.2%。進而企業研發動力不足。在研發強度方面，香港上市科技企業平均研發投入佔營收比重為3.8%，顯著低於矽谷企業的15%-20%。2023年工商機構研發支出僅129.76億港元，不足韓國的二十分之一。主要後果是科研成果難以有效轉化為實際生產力。（4）科技企業生態發展緩慢。與矽谷相比，香港在科技企業密度（香港為矽谷的17%）、獨角獸企業數量（香港為矽谷的3.8%）、風險投資額（香港為矽谷的1.7%）、專利授權量/萬人（香港為矽谷的13.4%）等指標上全面落後。香港至今未誕生一家世界級科技企業，而一岸之隔的深圳同期培育出華為、騰訊等全球科技巨頭。此外，香港高等教育中理工科專業缺乏就業場景和發展動力。（5）資本與科技企業結合滯後。2023年香港上市科技企業達137家，市值超百億美元的僅4家（如商湯科技），而同期納斯達克百億級科技企業超過200家。假定在佔有GDP6%的第二產業中，有50%是科技產業，那麼科技產業在香港經濟中佔比也僅僅是3%左右。2024年第三季度，恒生行業分類中「資訊科技業」僅佔港總市值的11.2%，遠低於金融（34.6%）和地產（18.9%）。（6）香港的數據要素市場化建設落後。2024年香港數據交易市場規模約12億元，僅為深圳（540億元人民幣）的2.2%。資本市場對科技企業的支持力度弱。2024年香港IPO募資額中，科技企業佔比僅18%，且估值中位數（8.2倍市盈率）低於納斯達克25.6倍。其根本原因是缺乏資本注入。香港機構投資者中用於科技領域的基金佔比不足5%，而矽谷這一比例超過40%。（7）大數據和人工智能基礎結構建設滯後。在基礎設施層面，香港超級電腦「鵬城雲腦」的算力（1000P FLOPS）僅相當於深圳同類設施的1/10。政務數字化方面，香港僅有23%的公共服務實現全流程線上辦理，而內地一線城市普遍超過80%。

（未完，明日續）

# 穩定樓市 社會對預算案寄予厚望

姚志勝 全國政協常委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會長



新一份財政預算案即將公布，外界普遍關注政府的財赤以及發展動能問題。這兩個問題的破題之眼其實都在於樓市。樓市是香港經濟最重要的支柱，穩定樓市不但關係廣大置業人士的切身利益，更與財赤以及發展動能息息相關。香港要紓財赤振經濟，首要是穩定樓市，社會各界對於預算案提出進一步提振樓市措施亦寄予厚望。建議特區政府從需求側着手，通過釋放內部需求和引入外部需求，加快去庫存從而穩定樓市。內地主要城市在中央出樓市「組合拳」後，樓市已經逐步回穩，為經濟復甦注入動能。香港可充分借鑑內地經驗，在新一份預算案大力穩樓市、促消費、振經濟。

香港樓市去年受惠於特區政府全面撤辣，整體物業成交量全年錄得68,516宗，按年升約18%，但距離高位仍有一段距離，而且全年樓價亦下跌超過6%，反映香港樓市仍然疲弱，需要特區政府採取更有力的提振措施。

## 穩樓市是社會最大呼聲

香港的樓市問題不單是樓價升跌的問題，更關係整體經濟以及政府的收入。樓市是香港經濟的一個「蓄水池」，普羅市民大多數的資產都投入樓市之中，樓市升跌將直接影響廣大市民的信心，如果樓市持續下跌，將造成嚴重的「負財

富」效應，打擊內需市道。對工商界而言，香港企業大多以物業作抵押向銀行借貸，樓價跌跌不休，也會削弱工商界的融資能力，而發展商更會因樓市疲弱而無能力繼續在香港推動大型發展項目。

社會各界都高度關注特區政府的財赤問題，並且提出不少節流措施。固然，針對一些社福政策進行優化，減少濫用是應有之義，但應對財赤問題不能單靠節流削減福利，更應從開源着手。香港過去能夠負擔龐大的福利開支，主要原因是樓市保持增長，香港土地有價，從而為特區政府提供穩定的收入。

然而，在樓市不景之下，政府的賣地收入大幅減少，2024年本港全年共推出3幅住宅官地，除了位於柴灣祥民道用作私人興建資助出售房屋的住宅地流標，其餘兩幅沙田住宅地成功批出，合共賣地收入為16.4億元，若連同兩幅電動車充電站地皮計，4幅官地收入只有區區的17.4億元。這與以往好景時動輒千億計的收入相比不啻是天壤之別，也是香港財赤急惡化的原因，期望通過削減幾十億元的社會福利來解決財赤問題，只是杯水車薪，癥結始終要從樓市着手，通過穩樓市恢復賣地收入。

樓市關係千家萬戶切身利益，穩定樓市已經成為香港社會最大呼聲。香港樓市當前最大問題不是供應不足，而是需求不足，這需要從需求面着

手，通過去庫存、振需求以穩樓市。

## 從需求着手去庫存穩樓市

一是加大力度釋放內部需求。當前樓市已經出現較大幅度調整，不少市民特別是青年人都希望借此機會上車，他們面對的最大問題是首期不足，建議政府盡快推出「強積金首次置業計劃」，讓首次置業的青年人，可靈活地使用其強積金供款結餘，作為首次置業的首期資金或供款，以提振樓市的內部需求。

二是引入外部需求。香港的投資者入境計劃一向深受歡迎，這反映了香港對於高資產人群的吸引力，這些都是香港樓市的潛在外部需求。但現時「新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」卻門檻太高。當前全球都在爭奪高資產人群，香港更不應抱着「皇帝女唔嫁」心理，建議進一步優化「新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」，下調住宅物業成交價5,000萬元的門檻，解除高房地產投資計入總投資1,000萬元的上限，購買房地產的投資，都計入投資移民的數額。同時，向「高才通」計劃等外來人才提供較為寬鬆的按揭支援，既為香港搶人才，更為樓市引活水。

對於有意見認為應該暫停賣地一段長時間，以逐步消化現有庫存。這種做法過於消極，一方面將令政府財赤問題更加惡化，另一方面也會給外界一個負面形象，令香港樓市受到更大

衝擊。其實，隨著愈來愈多外來人才來港，對於樓市的需求一定愈來愈大，停止賣地建屋反而不利於樓市可持續穩定發展。特區政府在推地上應該把握好節奏，更重要的是先做好去庫存，穩定樓市工作，待樓市回穩，賣地自然水到渠成。

## 中央穩樓市立竿見影

必須指出的是，中央充分理解到樓市的重要性，去年接連出此一連串貨幣金融政策「組合拳」，明確釋放穩增長、穩樓市及穩股市的強烈信號，當中更提出要促進房地產市場止跌回穩，對商品房建設要「嚴控增量」、「優化存量」、「提高品質」，加大「白名單」項目貸款投放力度，支持盤活存量閒置土地，力度之大，手段之多，覆蓋面之廣極為罕見，體現中央對穩樓市的重視。

在中央的「組合拳」之下，內地房地產市場持續回穩，1月份土地市場強勁反彈，銷售收入按年增長26%，一線城市二手樓價在1月保持基本平穩，近期的二手交投量已超越農曆新年前水平。隨着3月重要銷售季即將來臨，市場情緒亦轉為審慎樂觀，反映中央的穩樓市舉措立竿見影，更表明要穩定樓市需要有大舉措、大手筆、大氣魄，以「組合拳」方式全面出手。內地的經驗值得特區政府借鏡，在預算案推出更有力的穩樓市措施。

# 民主黨窮途末路咎由自取

高子明

曾經是所謂「泛民」最大勢力政黨的民主黨，如今樹倒猢猻散，近日傳出醞釀解散的消息。民主黨窮途末路，完全是咎由自取。民主黨與反中亂港分子勾結，與外部勢力沆瀣一氣，劣跡斑斑，嚴重破壞了香港的法治和社會秩序，損害了國家和香港的根本利益。這種行為違背了民主黨成立的初心，背離了香港市民的根本福祉。民主黨的沒落證明，任何破壞香港穩定、挑戰國家主權和安全的行為都是不得人心的，也注定失敗。

創黨逾三十年的民主黨，曾堅持「和理非」的溫和路線。然而，為謀取政治利益、博取反對派支持者關注，不惜越走越偏激。從2014年起，民主黨數十名黨員公然表明參與違法「佔中」，逐漸與激進反對派站在同一陣線。這一行為不僅違背了民主黨的初衷，更將香港推向了動亂的邊緣。到了2019年修例風波，民主黨議員更是變本加厲，與其他反中亂港分子沆瀣一氣，許智峯、林卓廷之流公然為暴徒打掩護，阻礙警方執

法；更長期騎劫立法會、區議會的平台，阻撓政府施政。這些行徑無疑是對香港法治和社會秩序的公然挑戰，也是對香港市民根本福祉的極大損害。

2020年底，羅健熙接任民主黨主席後，漠視香港市民和香港社會的長遠利益，淪為西方反華政客的代理人。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後，羅健熙與該黨前主席劉慧卿等人到處散播「選舉無用論」。同年9月，有美國媒體抹黑立法會選舉，羅健熙等人馬上

跟隨並阻止黨員參選，更向尋求民主黨支持的黨外參選人發出長達六頁的所謂「問卷」，脅迫參選人承認一系列無法無天的「訴求」。

在羅健熙的腐敗領導下，民主黨由曾經的「立法會第一大黨」變成議席「清零」，但羅健熙仍不知羞恥，狂言不排除民主黨重返「壓力團體」之路。不過，民主黨早已四分五裂。羅健熙依然死不悔改，更多次撰文公然唱衰香港、抹黑完善後的選舉制度。

民主黨背離正道，盡失人心。如今日落西山，正是其錯誤行為的必然後果。歷史已經無數次告訴我們，任何試圖破壞香港穩定、挑戰國家主權和安全的行為，都是不得人心的，也是注定要失敗的。